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4

宋辽西夏金元卷

李致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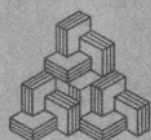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4

宋辽西夏金元卷

李致忠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李致忠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68 - 1786 - 8

I. 中… II. 李… III. 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
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辽宋金元时代③出版工作—
文化史—中国—西夏 (1038 ~ 1227) IV. G23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3915 号

责任编辑/柳 华

责任印制/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正文印张/36.5 彩页印张 0.25

字 数/528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

第一章 宋代出版事业勃兴的社会背景	1
第一节 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	1
第二节 宋代出版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5
第二章 宋代的官方编修与繁荣的私人撰述	14
第一节 宋代官方的编修机构与编修活动	14
第二节 宋代繁荣的私人撰述	40
第三章 宋代的出版机构与出版概况	55
第一节 宋代的官方出版机构与出版概况	55
第二节 宋代的民间出版概况	81
第四章 宋代的重要出版家及其出版事迹	92
第一节 江浙地区的重要出版家及其出版事迹	92
第二节 四川地区的重要出版家及其出版事迹	100
第三节 福建地区的重要出版家及其出版事迹	104
第四节 江西地区的重要出版家及其出版事迹	113
第五章 宋代出版图书的主要内容及出版思想	120
第一节 宋代出版图书的主要内容	120

第二节	宋代的出版思想	136
第六章	宋代出版图籍的装帧艺术	143
第一节	宋代出版图籍的版式行格	143
第二节	宋代出版图籍的插图版画	147
第三节	宋代出版图籍的字体与符号标识	151
第四节	宋代出版图籍的用纸	154
第五节	宋代出版图籍的装订形式	156
第七章	宋代出版物的发行流通概况	159
第一节	朝廷宣赐价卖促进出版流通	159
第二节	坊肆书贾经销促进出版流通	163
第三节	对外宣赐与行销促进出版流通	166
第八章	宋代朝廷对图籍出版流通与版权的管理	170
第一节	宋代对图籍出版流通的管理	171
第二节	宋代对图籍版权的管理	180
第九章	宋代雕版印刷术的高度成熟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	184
第一节	宋代雕版印刷术的高度成熟	184
第二节	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190
第十章	辽代出版事业的概况	194
第一节	辽代图籍出版的社会背景	194
第二节	辽代图籍的出版概况	196
第三节	辽代出版图籍的装帧艺术	211
第十一章	西夏出版事业的概况	217
第一节	出版事业的社会背景	217
第二节	图籍的编撰	223

第三节	图籍的出版和流传	253
第四节	出版机构和人物	269
第五节	西夏出版图籍的装帧艺术	281
第六节	元代西夏文书籍的出版	289
第七节	西夏出版物的价值和研究意义	296
第十二章	金代出版事业的概况	299
第一节	金代图籍出版的社会背景	299
第二节	金代图籍的出版概况	302
第三节	金代出版图籍的装帧艺术	316
第十三章	元代出版事业继兴的时代背景	323
第一节	元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	323
第二节	元代出版事业继兴的基本情况	330
第十四章	元代的编修机构、编修活动与私人撰述	335
第一节	元代的官方编修机构与编修活动	335
第二节	元代的私人撰述	348
第十五章	元代的出版机构与出版概况	365
第一节	元代的官方出版机构与出版概况	365
第二节	元代的民间出版概况	390
第十六章	元代出版图籍的装帧艺术	428
第一节	元代出版图籍的版式设计	428
第二节	元代出版图籍的插图版画	433
第十七章	元代出版物的发行流通概况	439
第一节	朝廷宣赐促进出版流通	439
第二节	元代出版物的市场营销	443

第三节 元代出版图籍的外贸流通	451
第十八章 元代朝廷对书籍出版与流通的管理	457
第一节 元代朝廷对书籍出版的管理	457
第二节 元代朝廷对书籍流通的管理	459
第十九章 元代对出版印刷技术的推进	466
第一节 元代对活字印刷术的推进	466
第二节 元代对套色印刷技术的推进	472
第二十章 宋元时期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出版业的繁荣	478
第一节 契丹文文献的出版	479
第二节 女真文书籍的出版	487
第三节 回鹘文书籍的继续出版	493
第四节 藏文书籍的继续出版	505
第五节 回鹘式蒙古文书籍的出版	521
第六节 八思巴字书籍的出版	531
第七节 傣文文献的出版	539
第八节 察合台文书籍的出版	544
第九节 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出版特点	546
附录一 宋辽西夏金元出版大事记	549
附录二 参考文献	567
后 记	575

第一章 宋代出版事业勃兴的社会背景

宋代是我国出版事业发展史上勃兴的时代，也是黄金时代。两宋319年间，出版规模之大，出版图书数量之多，刊印之精，流通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两宋的出版事业究竟为什么会达到如此发达的程度，这要从两宋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风尚、军事形势、社会与民族矛盾等诸方面去寻找原因，从而总结出出版事业在两宋达到空前发展并十分出色的客观规律。

第一节 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

公元960年元旦，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一夜之间黄袍加身，推翻了五代后周政权，建立了赵宋王朝。

赵宋王朝建立政权之后，接受的是一个经过半个多世纪战乱纷争、生产破坏、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烂摊子。刚刚诞生的赵宋王朝，要想在这种流沙一样的基础上稳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和适当的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全国统一的政权。

自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直到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五代十国割据局面，中国一直处在战争连年、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其中重

要原因就是地方藩镇的权力过于集中。他们不但各自掌握着雄厚的军事力量，而且掌握着各个地方的政权、财权和司法等权。所以早在唐朝中叶以后，地方藩镇实际早已形成割据势力。五代十国的出现，实际就是这种藩镇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赵匡胤不但清楚这些历史，而且他自己也恰恰是依靠所掌握的精锐禁军，用军事政变的方式为自己夺得了政权，所以他深知掌握军权的重要和军权旁落的威胁。因此，在他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赵宋王朝之后，首先就是夺取中央禁军的指挥权和削弱地方节度使的军权、政权和财权。

后周的中央禁军统归殿前都点检指挥和调遣。宋朝建立以后，首先分散禁军的统辖权，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三司分别统辖。而三司又只能在平时对禁军实行管理和训练，没有调遣权。调遣权归枢密院领属，而枢密院则任用文人而知兵者，并且由皇帝直接指挥。所以对中央禁军统辖权的分散，实质是为了皇帝更高度的集中。这就给任用文人，以文抑武政策的确立与实施开辟了道路。

在中央集中权力的同时，就是削弱各地方节度使的特权。唐、五代时的地方节度使，兼领数州，地方上的军、政、财、文、司法等大权，统归节度使节制，形成了实际上的地方独立政权。这是出现唐末至五代割据自立的重要原因。宋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全国的统一，虽然在表面上仍然保留着节度使的名号，实际只不过是个空衔。也就是说，宋朝各地方虽然还设有节度使，但各地方的州、县长官却都由朝廷派遣文人去充任，不再听节度使的支配，这样就把地方政权从节度使手中夺了过来。同时朝廷还派遣文人到各州、县，充当通判，监督地方长官，并与地方长官共同掌管地方行政事务。派遣文人充任监当使臣，到地方掌管各州、县的财政与税收。又增设转运使和转运通判，负责把各地的税收、财物运往中央。这样一来，就把唐末、五代以来军、政、财等大权统归节度使掌管的局面一分为三，而又通过朝廷派遣的州县长官、通判、监当使臣、转运使、转运通

判，互相监督，互相牵制，最后再达到三者合一，统归朝廷，集权中央。

宋王朝建立政权之后，围绕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所采取的这一系列重大措施，引起了用人路线的重大变化。宋太祖曾对他的近臣赵普说过，我现在用儒臣分治各藩，纵使一百个儒臣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一个武将作乱后果严重。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宋王朝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就逐渐用文臣代替了武将，即便是在军队中也多用文人而知兵者。这种因政治变革所引起的任人路线的重大变化，不但带动了习文的社会风气，而且又引起科举制度的相应变化。

科举制度在隋唐早已实行。但唐代的科举多被门阀贵族所操纵，寒门出身的人考中并为官者甚少。唐末农民大起义，有力地打击了这种门阀制度。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这种门阀制度难以恢复、继续和发展。到了北宋，一方面继续摧毁这种门阀制度的残余和习惯势力，一方面使科举更加广泛地向文人开放。只要文章合格，不论门第高低，出身贵贱，均可录取。录取之后即可量材推官，使之成为宋王朝封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国家统一的维护者。并且从宋太祖时候起，逐渐加强科举取士。两宋前后共历319年，科举考试，包括恩科，一共举行130榜，平均每2.4年就开科一次。并且每科取士一次比一次多。还对多次科考而久不中式者表示莫大的关心，认为他们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因而可以宽恩特赐本科出身。以后这种特赐还形成了定制，凡考试多次而不中者，都可特赐，叫做“特奏名”。宋代这种科举制度的改变，大大刺激了社会各个阶层读书应考，考取做官，做官富贵的热情，致使整个社会形成了潜心经术、倾心文章、崇尚文化的浓重气氛，这是宋代出版事业勃兴发达的重要社会背景。

“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1】}。这是宋太宗对王者之道的高度概括与深刻总结，说明宋朝的最高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文武兼施的统治策略。所以宋朝自夺得政权以后，在运用武力

【1】[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三《圣学》。

征服各个尚未归服的独立王国、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对于能够教化归服各地民心、巩固国家统一的文化事业，也不遗余力地加以实施。如统一法制、编订律例，尊崇儒术，崇信佛、道教以及提倡三教一义等，北宋初期的几个皇帝就都很注意。总之，这一系列文治政策的推行，不但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促进了国家的统一，而且对出版事业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当然，要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恢复社会经济，努力发展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

唐、五代时按照门阀士族的等级占有土地和农奴的部曲制，被宋时地主只能购置田产和对佃客进行租佃剥削的租佃制所代替。宋代这种土地占有制和剥削关系的变化，虽然未从根本上改变地主剥削农民的本质，但对于唐、五代时期那种门阀士族占有土地并占有农奴的部曲制来讲，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农民则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解放和劳动生产的自由。加上宋初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改良耕作技术等，所以农业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各种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城镇建设等，也相应得到了恢复、发展并逐渐繁荣了起来。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但大大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与巩固，使社会得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同时也使其他一切事业获得了发展的经济基础，如冶炼、烧瓷、织染、造纸直至本书所要讲的出版图籍等。

除此而外，出版事业也还有其自身发展的背景和条件。如前所述，早在唐、五代时期，雕版印书技术及事业不但早已发生，而且有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酝酿和实践阶段。在唐代，今四川、浙江、淮南、福建一带早已出现了刻书出版事业。到五代时期，虽然朝代频繁更迭，十国割据并立，但刻书出版事业由于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却在这种抢攘乱离的夹缝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所有这些，不但构成了宋代出版事业勃兴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而且从雕刻工人的培养、印刷力量的积蓄、技术造诣的提高等多方面，都为宋代出版事业的兴盛和发达做了充分的准备。因

此,进入宋朝之后,当国家获得统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经济获得发展,文化需求和水平获得进一步提高的时候,出版事业便应时勃发了起来。

宋王朝的建立是靠政变一蹴而成的,但扫平中原与南方诸割据王国,建立统一的政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气力。特别是对于北方契丹人的辽、党项羌人的西夏以及后来女真人的金,宋朝政府虽多次进行尝试,想进一步完成统一的大业,但终因内部意见不一,实力不足,不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反使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始终与两宋南北对峙,并以他们的铁骑不断南下侵扰,使得宋朝赔款、割地、失主、迁都。因此,在如何对待北方的辽、西夏、金等问题上,构成了宋朝朝野尖锐的矛盾与斗争,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宋王朝制定国策的着眼点和出发点。这种民族与政治上的矛盾与斗争,反映在刻书出版事业和对出版事业的管理上,便是随着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提倡出什么书、严禁出什么书,其倾向表现得非常鲜明。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研究两宋出版史所应当注意到的问题。

第二节 宋代出版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宋罗璧《罗氏识遗》说:“宋兴,治平(1064—1067年)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1068—1077年)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1]罗璧,字子苍,自号默耕,新安人。生当宋末元初,乃传朱子之学者。其《识遗》十卷,盖结稿于宋亡之后。其爬梳钩索,征据旧文,颇可采信,故其所谓英宗治平以前出版禁令犹严,神宗熙宁以后此禁方弛的说法,大体可信。推其原因,盖是宋代先坐江山,后打天下,边打仗,边建国,自然诸事谨慎。至神宗,已立国百年,江山已固,又推行新法,版禁始开,为宋代此后二百余年出版事业的勃兴,营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正是在这种政策、环境都适宜的背景下,宋代在出版机构、出版规模、出版数量、出版品质等诸方

[1] [宋]罗璧:《识遗》卷一。

面，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

宋代的出版机构，按其自身的性质大体可分为官办、私营和民间集体经营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的出版目的和宗旨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在构建宋代出版网络，推动出版事业繁荣兴盛上，在客观上却有着共同的贡献。

所谓官办，是指中央各部、院、司、局，各殿、监、省、所；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司、台、库、所；各府、州、军、县学校，以及各地书院，主持或出公帑从事图籍出版业务的官方机构。这种机构，论性质多为中央官府和地方官府的行政或职能部门；而府学、州学、县学、郡斋、郡庠、学宫、黉宫、县斋、学舍，以及各地书院，则是教授作养之所，一句话，它们都不是专门的出版机构，但又都多寡深浅不同地涉足出版活动，这就大大活跃了宋代出版事业的社会气氛，为私营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示范和良好环境。

所谓私营，是指各地私宅和坊肆主持或投资从事出版业务的私家或书坊。宋代的私宅出版与坊肆出版，虽然都属于私营，但其性质与宗旨是不完全相同的。私宅出版，其投资虽也是私家所出，但目的多数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学术，并不完全以是否盈利或盈利多少为切入标准。如鹤林于氏家塾刻印出版的《春秋经传集解》，黄善夫家塾之敬室刻印出版的《史记》三家注合刻，蔡琪家塾刻印出版的《汉书集注》，蔡梦弼东塾刻印出版的《史记集解索隐》，蔡子文东塾刻印出版的《击壤集》，陈彦甫家塾刻印出版的《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廖莹中世彩堂刻印出版的《韩》《柳》集等等，均可视为宋代的私宅出版物。这些出版物通常都是校勘精审，版印精良，书品极佳。虽然这些私宅出版品也发行出售，但主要是为嘉惠学林，承传学术，赚回成本，略有盈余。与坊肆出版商以盈利为宗旨而投资刻印的出版物，是有本质区别的。尽管坊肆出版物中也不乏精品，但出版目的与私宅还是有不同的。《天禄琳琅书目·茶晏诗》谓两宋私营出版家以“赵、韩、陈、岳、廖、余、汪”七家最有名。赵者，指长沙赵淇；韩者，

指临邛韩醇；陈者，指临安解元陈起；岳者，指岳飞的孙子岳珂；廖者，指贾似道的门人廖莹中；余者，指建安万卷堂余氏；汪者，指新安汪纲。这七家私宅与坊肆相混，如陈起及万卷堂，便是典型的书铺子，是坊肆掌柜，而不是私宅主人。但不管怎么说，作为私营出版家，这两股力量都是不可忽视的。

据现存宋版书的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私宅、坊肆出版家就有105家。其中如刘日新宅的三桂堂、鹤林于氏家塾的栖云阁、杭州大隐坊、余氏万卷堂、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金华双桂堂、廖氏世彩堂、钱塘王叔边、毕万后裔魏齐贤宅富学堂、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刘通判宅仰高堂、蜀广都费氏进修堂、建宁府陈八郎书铺、临安府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杭州开笺纸马铺钟家、周必大、赵与簠（筹）、闽山阮仲猷种德堂、临安府贾官人经书铺、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建安黄善夫、义乌蒋宅崇知斋、汾阳博济堂、婺州市门巷唐宅、蔡琪家塾、蔡梦弼东塾、建安魏仲举家塾等等，就都是比较有名的宋代私人出版家。这些出版家活跃在全国各地，出版物行销到神州四方，构成两宋重要的出版亮点，是全国出版网络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两宋出版事业的有力支撑。

所谓民间集体经营，是指寺院、道观、家族祠堂等靠募捐或家族亲友等集资方式共同主持或投资而开展的出版活动。泉州开元寺、福州东禅等觉院、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安吉州思溪法华院、平江府磧砂延圣院等寺院，在宋代先后都曾募刻出版过释家大藏。宋释居简《北磻文集》还说：“近世蜀之昌州不动居士冯公，以无量寿愿，施五千四十八卷，凡四十八藏。《般若》、《宝积》、《华严》、《涅槃》合八百四十一卷，亦满厥数。”^[1]八百四十一卷，俗称《小藏》。此前他（冯楫）还向杭州灵隐寺舍过《大藏》。福州闽县万寿观，还奉敕开雕出版过《万寿道藏》。金华吕氏祠堂、严陵赵氏祠堂等，也都出版过族人先贤的著作。佛寺、道观的出版活动，内容上均系本教经籍的汇刻，目的都是做功德，祈福祉，因而在时间上此作彼仿，赓续不断；在规模上一

[1] [宋]释居简：《北磻文集》卷四。

藏比一藏大。有宋319年中，大概前后一共出版过七部释藏，两部道藏，在总卷数上大约比四部书少不了多少。所以寺院、道观之出版，也是两宋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把官方、私营、民间三大系统的出版机构合在一起加以不完全的统计，除中央各部、院、司、局、殿、监、省、所以外，就现存宋版书所能知晓的地方府、州、军、县，各提刑司、安抚司、转运司、茶盐司等机关和专司职能机构从事出版活动的仍有36家，府州军县学从事出版活动的仍有123家，各地书院从事出版活动的仍有9家。加上前边所统计之两宋私宅、坊肆105家，合计仍有273家。加上中央的出版机构，大约不下300家。这还是仅就现存宋版书，而且主要是国家图书馆所藏之宋版书上明确可知的出版机构，实际数字当比此数要大得多。八百多年前，就能有三四百家出版机构从事出版活动，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仅见的，可知两宋的出版事业是多么的兴旺发达。

宋代的出版规模，既反映在出版大部头书籍上，也反映在总体的出版物数量上。出版大部头书，在财力、校勘、镌刻、刷印、用纸、敷墨、折配、装帧诸方面，都比刻印出版一两卷、三五卷的小书要复杂得多。开宝四年（971年），距赵匡胤黄袍加身仅有十年，便由朝廷派遣高品职司人员张从信前往益州，即今成都，监雕释家大藏13万版，5 048卷，480函。这是我国第一部刻印出版的释家《大藏经》，也是我国用雕版印刷技术出版的第一部大部头的释家典籍。如此规模的出版，就是在今天，仍令人叹为观止，可是中华民族在一千多年前就做到了。此后三百余年，释、道两家的单经大藏、前朝旧典、四部书的官修私撰层出不穷，赓续不断，将我国的出版事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当然，时至今日，谁也无法确切统计出两宋到底出版了多少典籍，但从几部重要书目著录中可略知梗概。

第一部是《崇文总目》。这部目录是北宋崇文院，其中包括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目录。此目编成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距立国已80余年。凡六十六卷，叙录一卷，

为王尧臣、欧阳修等奉敕编撰。其体例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有大序、部序、类序，每书款目之下有提要。共收图书三万六千六百六十九卷。惜原目已佚，无以窥其全貌。清修《四库全书》，采用《永乐大典》辑本，厘为十二卷。嘉庆四年（1799年）钱东垣又从《欧阳文忠公集》、《玉海》、《文献通考》等书中辑为五卷，并补遗、附录各一卷。较《四库》辑本已多，可得原目十之三四。钱氏辑本后来刻入《粤雅堂丛书》，今据该丛书本加以统计，其录经部书193种，2 263卷；史部书655种，7 768卷；子部书1 824种，4 991卷；集部书744种，5 868卷。总为3 416种，20 890卷。如果这些只是全目的十之三四，则照此推算全目收书当为8 540种，或者更多更少一些。这个数字已十分可观。钱东垣《崇文总目附录》又说：“政和七年（1117年），校书郎孙覿言：‘太宗皇帝建崇文殿为藏书之所，景祐（1034—1038年）中仁宗皇帝诏儒臣即秘书所藏编次条目，所得书以类分门，赐名《崇文总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为秘书，厘正官名，独四库书尚循《崇文》旧目。顷因臣僚建言，访求遗书，今累年所得《总目》之外凡数百家，几万余卷。乞依景祐故事，诏秘书省官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乞别制美名，以更崇文之号。’乃命覿及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通撰次，名曰《秘书总目》。”^[1] 政和是宋徽宗的年号，已届北宋末年。《崇文总目》经过这次补充，更名为《秘书总目》，其收书当已品种有加，卷帙大增。至金人破汴，北宋内府藏书及所雕书籍版片，被金人捆载而去，国子监、三馆、秘阁书及版片荡然无存。并移文开封府，令现钱支出收购民间藏书。一个半世纪的出版成果，被金人毁于一旦。

宋朝南渡后，经高宗的不懈努力，经济很快恢复和发展，史称中兴。“靖康之变，中原板荡。及偏安江左，庶事草创，唯网罗散逸较之先朝独无歉焉。虽旧典视前少损，多当代编述，然自今日视之，所纪者皆七百年前故籍”。故“淳熙四年（1177年）十月，秘书少监陈騭等乞编书目，五年六月上之，凡七十卷，序例一卷，五十二门”^[2]。这部《中兴馆阁书目》共著录图书44 486

【1】[清]钱东垣：《崇文总目附录》，《粤雅堂丛书》本。

【2】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序》，1933年北平图书馆、中华图书馆协会合刊之《古逸书录丛辑》或1987年11月现代出版社出版《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上。

卷，种数不得而知。1932年贵阳赵士炜复从《玉海》、《山堂考索》、《直斋书录解题》、《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词学指南》、《小学紺珠》、《宋史·艺文志》诸书中钩沉考索，得《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五卷、《中兴馆阁续书目辑考》一卷。其中《中兴馆阁书目辑考》经部收书577种，5 555卷；史部收书470种，7 283卷；子部收书319种，4 680卷；集部收书56种，1 235卷。四部总共收录图书1 422种，18 753卷。辑出来的五卷书目就著录这么多书，如果依书目原卷数将此数扩大14倍，那就是19 908种，262 542卷。实际上当然不可能如此形而上学地推算。但此目收书多为宋时当代著述，且种数卷数均比《崇文总目》所录图籍有加，则是事实。加上嘉定十三年（1220年）秘书监张攀主持编撰的《中兴馆阁续书目》三十卷所录淳熙五年（1178年）以后馆阁新书14 943卷，总卷数已达59 429卷，大大超迈前代。元代修《宋史》，其《艺文志》所著录的图籍，基本来源就是《中兴馆阁书目》与《中兴馆阁续书目》。

今考《宋史·艺文志》，谓：“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1〕}可知北宋有书凡6 705种，73 877卷。“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移蹕临安，及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自是而后，迄于终祚，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彙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前后部帙有亡增

〔1〕《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序》，中华书局校本。